

# 陈舜俞:人生莫作等闲别

## —上海两千年历史人物考(十四·上)

又提高取士比例,变“十取其一”为“十取其二”。

可以说,陈舜俞生逢其时,遇上了自古少有的科举盛世东风。

然而,他13岁时,罢童子科——写出“无可奈何花落去,似曾相识燕归来”的北宋名相晏殊,当初就是以神童登科的。

等到他16岁时,又取消考生提前上交平日诗文、露出真实姓名的“公卷”制,只凭一考定终身了。

然而他18岁时,又“翻烧饼”——不弥封试卷“先考其履行”,要露出姓名、要看平时了。

次年又出台不少考试新法,下年春天又骤然作废,而秋试已迫在眉睫。

之所以反复变化,正是宋仁宗当时用范仲淹等力推“庆历新政”,朝堂较量的一种体现。范仲淹上十条国策,第三条就是革贡举。

好在,陈舜俞很厉害。而且,他的老师很厉害。

### 3. 胡瑗

有句话是“北宋四真常在,宋不亡”。“四真”出自毛泽东生前最后要看的书《容斋随笔》:真宰相富弼,真翰林学士欧阳修,真御史包拯,真先生胡瑗。

陈舜俞15岁那年,时任湖州太守滕子京建新州学,聘胡瑗为师。虽然很快八月胡瑗就被范仲淹辟为推官,去了边境,但三年后回到了湖州教学——实在太会教了,次年有关部门就奏请“下湖州,取先生之法”,用国家最高学府:太学。

后来胡瑗也任职太学,于是“四方之士归之”,结果校舍都不够用了,要在一旁扩建。

许多年后,宋神宗问:“胡瑗与王安石孰优?”

回答是:“臣闻圣人之道,有体、有用、有文……(臣师胡瑗)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,夙夜勤瘁二十余年,专切学校,始于苏、湖,终于太学。出其门者,无虑数千人。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之体,以政教之本,皆臣师之功,非安石比也。”

“二程”中的程颐对胡瑗礼敬有加。写《爱莲说》的周敦颐“非‘安定先生’(人们对胡瑗的尊称)‘不称’,并感叹说:“凡从安定先生学者,其醇厚和易之气,一望可知。”同样的话史料中还有一句:“礼部所得士,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……人遇之,虽不识,皆知为先生弟子也。”

其中,陈舜俞更是“以名称于辈流间”——赢得了同辈的赞扬、在同辈间出了名的佼佼者。

然而吊诡的是,他生逢大举取士之年,又是安定先生“高弟”,且遇庆历新政之年,是新政之际第一批“黄浦军校生”,却最终成了堪称仅有的一届。

陈舜俞积极备考那两三年,正是庆历新政昙花一现的两三年。新政被视为北宋乃至整个宋代一次历史窗口期,陈舜俞却在顺利考中进士、踏上历史舞台、正要一展身手之时,猝然面对丧父离职,加上新政彻底失败,失去了时代的托举,走向了艰难的一生。

《示诸弟》一诗中,陈舜俞悲恸地写过:“吾家崛起蓬蒿间,先君为学良苦艰。典衣买书教我读,平生贫窭(贫寒)不此(吝啬)。岁晚才沾寸禄养,天祸无何倾泰山。”

一生贫寒的父亲典当衣服买书教他,好不容易现在可以享点福了,却祸从天降。

这不是命运第一次对陈舜俞开玩笑。

### 2. 晏殊

陈舜俞出生前两年,宋仁宗朝首次科举,惊人地取士485人——前三朝最多的一年才127人。

陈舜俞出生第二年,晏殊罢相来到府院书局(在今河南商丘),聘范仲淹为师兴学,开“五代以来”新风。后来的名相、此时24岁的富弼,就在此攻读。同年,仁宗朝第二次科举,再次惊人地取士1076人,得王尧臣、韩琦、文彦博、包拯、吴育等众多后来的名臣。

及至陈舜俞出生第九年,宋仁宗

遗存,如今是文化、体育、艺术集聚的城市秀带。”徐汇区体育局副局长戴文蔚说,“我们连续几年选择在这里承接高百这样的青年赛事,就是希望把城市更新的成果和青年群体的气质叠加起来。通过比赛,让更多人看到这条江边的变化;通过这条江,也让高百更有吸引力。”

今年的总决赛赛道从穹顶艺术中心出发,一路穿过西岸文化集群,沿江折返。跑者眼前,是日渐成型的滨水公共空间和一座座新地标;赛道外,是围观市民、游客和专门赶来的高校校友。这里既是“城市封面”,也是青年周末的活动主场。

在赛道终点一侧,“跟着赛事汇就业”的海报格外醒目,旁边是徐汇



## 二、欧阳修

### 4. 韩琦

先从韩琦说起。可能不太为人熟知,但他其实是与范仲淹一起纵马边疆的北宋大将、与范仲淹联手推动“庆历新政”的朝堂重臣。时人并称的是“韩范”,他排在范仲淹之前。

至今成谜:这位举足轻重的三朝大臣,究竟是怎么与陈舜俞相识,且深度关联一辈子的?

有一点蛛丝马迹:他曾一次参倒4位宰相,与陈舜俞后来举动的刚正之气,倒是相契。陈舜俞自己也说过,早年做韩琦门客时,被“待以国士之礼”。

但陈舜俞的人生确实不易。就在他似守丧期满要复出时,大臣张方平的报告显示:当时冗官依然严重到“大约三员守一阙”——三个人等一个空缺。包拯的数据也吻合:全国1万7千多人待选,“用吏不过五六千员”。

而此时24岁的陈舜俞,老母在堂,诸弟尚小,身为长兄正肩负家门重望,又在当年护送父亲之棺回老家后曾立下誓言:请求宗族乡里之人,等自己勉力“固所树立”有所出息,有资格有能力请动“天下看重之人”为父亲写祭文,讲述先人教子之勤,争取朝廷追封之后,再下葬。

不少研究者谈到:久丧不葬,在宋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,甚至有逝者32年不下葬。史料也显示,就在陈舜俞丧父两年时,“积十二年未葬者,凡四百余丧”。

宋在这件事上的突变,与风水、厚葬观念有关。不过陈舜俞这么做,应主要为报答父亲。

然而吊诡的是,他生逢大举取士之年,又是安定先生“高弟”,且遇庆历新政之年,是新政之际第一批“黄浦军校生”,却最终成了堪称仅有的一届。

陈舜俞积极备考那两三年,正是庆历新政昙花一现的两三年。新政被视为北宋乃至整个宋代一次历史窗口期,陈舜俞却在顺利考中进士、踏上历史舞台、正要一展身手之时,猝然面对丧父离职,加上新政彻底失败,失去了时代的托举,走向了艰难的一生。

曾被命运击中,却没最终闭环。某种意义上,他堪称胡瑗最坎坷的弟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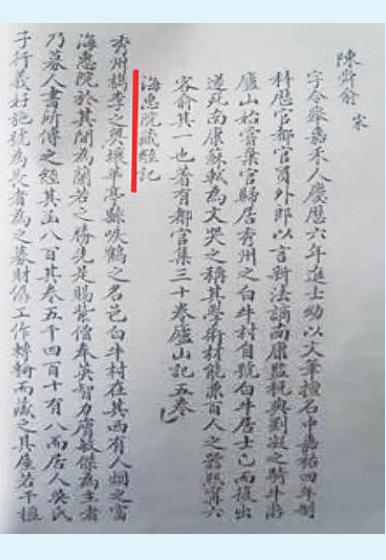
却又是最终打动了苏轼的人。闻南说话:人生海海。罗曼·罗兰说:真正的英雄主义,是在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,依然热爱。历史也往往像一位无巧不成书的作家——就在陈舜俞从大喜走向大悲那年,面对新政彻底失败的范仲淹写下千古名句:“先天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。”而另一位被贬的官员、后来是苏轼恩师的欧阳修,也自得“其乐”,写下“环滁皆山也”。

同样,正守丧的陈舜俞也并未沮丧消沉,而是以父亲之名向未来立了一个志。

为此他用了13年,走到了欧阳修面前。

5. 富弼

仿佛消失了6年,直到三十而立



时,陈舜俞才在一篇为崇德县(在今桐乡一带)福严禅寺写的记里,再次在历史文献里显露出人生轨迹——这篇记的落款为“宣德郎、试大理评事、权雄州防御推官”。

这是宋代官职常见组合方式,一种解读是“官、职、差遣”,最后的“差遣”即这里的“权雄州防御推官”才是实际岗位。权,暂代官职。雄州,在今雄安新区雄县一带。防御推官,是否分管军事政务的副秘书长?

陈舜俞此时在这个职位,与《宋史》对进士仕途晋升的表述对得上——许多进士的升官之路正是“初入防御推官军事推官,并授以郎官、试校书郎;周三年得资,授承奉郎、试大理评事;又周三年得资,授宣德郎、试大理评事”,最后这个即陈舜俞写的落款,“周三年”又“周三年”也正吻合这6年。

这样看,他似一直在任。

不过看遍他的文集,似只有这一处出现了雄州,后来再未提起过,又好像并未赴任。

可以确定的是:这年六月名臣文彦博、富弼为相,“士大夫相庆得人”;这年秋天陈舜俞在吴中闻讯,马上十一月到京城、十二月上书富弼,次年又再次上书富弼。

首次上书,他便直言:坊间说您无所作为。

他的想法是:“请竭之始,宁若进说。”

富弼的做法是:“接以上客之礼。”

上客,贵重的客人。

随后数月,陈舜俞再未与富弼联系,直到第二年要远赴新任了,临别再次上书:“(自从拜访您后)无一名字闻阁下之左右,无一足迹及阁下之门,岂自弃耶?是恐见比于皇朝汲汲造进取之人,为识者羞辱。”是害怕像那些惊恐匆忙、心情急切来拜访求进的人一样,被有识之士瞧不起。

他将远赴的新职,似“明州观察推官”——是否明州(在今宁波一带)分管民政事务的副秘书长?

就在这个职位上,他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。

次年七月,明州观察推官夏噩成功考上制科,一举“改官”——从推官之类的州县幕职官,升为“京朝官”。改官之难,被视若登天。苏洵曾感叹:京朝官以下“皆劳筋苦骨,摧折精神,为人所役使”,像“仆隶”一样。今网友感叹:绝大多数人一辈子在幕职州县官七个级别通关打怪兽,“永沦选海”,有的一直“处选调三十年”,有的熬了26年未通关。苏轼则痛批:“今之君子,争减半年磨勘(宋代官员考核制度用语),似杀人亦为之。”

而且,夏噩不仅同为明州观察推官,还是当年与陈舜俞同一年考中进士的“同年”。

更何况,下一年又发生了让陈舜俞“手舞足蹈”(从书信看他真的这么做了)之事:富弼、韩琦为相。

庆历新政失败十多年后,这被当时许多人视为一次转机。

33岁的陈舜俞就此踏上冲击“制科”之旅。他给富弼写了一封长长的信,力陈为国之策——他深知制科考试极难,怕自己因“记诵之不及”碌碌无为而立

去,所以特地一吐为快,求“永无愧于古人”。

朱刚先生在《北宋贤良进卷考论》一文谈到,制科考试大致三关:一,必须有近臣推荐,交50篇策论;二,做6篇命题作文,题目甚至会从典籍的“注疏”里选一句乃至半句,记得出处才是关键;三,通过“御试对策”。

而且前一关过了,才能进入下一关。所以“制科”被视为“科举中的科举”。

陈舜俞有篇长文《太平有为策》,似即御试对策。文末他把自己忧国忧民的热忱,比作贾谊上“可涕哭者三、长太息者六”的《治安策》——毛泽东眼中“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”,由此也可一窥陈舜俞之志之才。

长达十年、连续两届空缺之后,这年八月,34岁的陈舜俞成功登顶制科中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(一说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),一举成为京官中的最高等——著作佐郎(一说光禄丞),再往上就是朝官了。

他的“差遣”,也升级为“签书寿州判官事(一说签书忠正军节度判官事)”,似即寿州(在今安徽凤台、寿县一带)秘书长。

王安石赠诗:“君能(一说今)壮岁收科第,我欲他时看事功。”

司马光赠诗:“海隅方万里,豪俊几何人。”

梅尧臣赠诗:“书对三千字(制科作文要求三千字以上),恩科第一人。”

而陈舜俞做了一件他一直念念不忘的事:上书欧阳修,希望这位当时“天下看重之人”,为自己的父亲写一篇祭文——在他心中放了13年的誓言。

这时候的陈舜俞,在人生高光时刻。

然而就在此时,一个让陈舜俞后来跌到谷底的人,越来越近。

## 三、王安石

之前、之后,陈舜俞与王安石都似未如此关系密切。

先是陈舜俞似在寿州隔空追和王安石6年前的一首诗,并邀请“公暇还来泛酒船”。再是陈舜俞为“今太守与介甫(王安石字介甫)”写下诗句“庐江贤守一家心”,称颂两人与汉代勤政爱民的庐江太守王景同姓。

他又远在千里之外的明州鄞县(在今宁波市鄞州区)镇国禅院写记。明州是他任职过的地方,而鄞县是王安石首次主政一方、当过知县的地方。这是两人的交集点。

他还被破格从两年前的著作佐郎,提前晋升为秘书丞,一般要三年。而起草这份诏书的正是王安石,文中赞赏有加:“三年序迁一等,此特有司之常法尔,岂所以待异能之士哉!”

秘书丞是“朝官”,陈舜俞就此从“京官”著作佐郎“更上一层楼”。而且秘书丞比著作佐郎高两级,按理似应3年一级、本来要6年,但他现在只用了2年。

还有,这年十二月,他为华亭县布金院(在今上海市青浦区白鹤镇一带)写记。而王安石也为上海写过“徒嗟大盈浦,浩浩无春秋”,大盈即布金院所在。

同在这月,陈舜俞听闻欧阳修不忘自己,便又欣然上书,并且举荐七人,同时再次念念不忘为父亲求祭文:“(上次致信后)先生哀其诚,而报曰:可。”(“希望能)小子无愧于乡人,赎十五年不葬之罪。生死肉骨,论报无有已也。”

他的孝,论心也论迹。

一切似乎都欣欣向荣。但陈舜俞的人生着实不易——就在寿州似三年任满、仕途本来将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时刻,38岁的他遭遇了自己的“黑色1063年”。

这一年,宋仁宗“暴崩”,宋英宗即位。

随后英宗反复发病,太后反复垂帘听政。一种记载是,最后韩琦厉声令人撤掉了帘子。

这一年,王安石也为母守丧离职了。

这一年,陈舜俞也做了一件异乎寻常的事:文集中绝无仅有地,接连三次

向皇帝上书。尤其后两次:一次写于十一月二十八日,进言帝王治理之道;后一次更力谏英宗亲政。

结果如何?《宋史》载:十二月己巳,英宗初御迩英阁。

记者从相关日期记载推算,“己巳”似十二月一日——那就是陈舜俞上书仅仅两天后。

又十天后,皇帝诏令:国子博士陈舜俞“与免远官”——不用被派到边远之地为官了。这是一种奖赏。

很可能,这是对他上书进言的回应。

国子博士,比秘书丞又高了一级。当然这也可能只是英宗即位、普行封赏的结果,就像王安石写过墓志铭的国子博士李问。

但应该说,从34岁至38岁,陈舜俞的仕途称得上快车道。

但随后他便似来了上海隐居。

并被这里的前贤打动。

## 四、船子和尚

### 6. 吕益柔